

王碧秀 林庆元 主编

林则徐经世思想研究

中国文史出版社

王碧秀 林庆元 主编

林则徐经世思想研究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则徐经世思想研究 / 王碧秀 林庆元 主编 .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中华学人丛书)
ISBN 7-5034-1234-8

I. 林… II. 王/林… III. 历史 - 文化 - 研究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616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韩淑芳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 / 32

印 张: 7.75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 - 1000 册 插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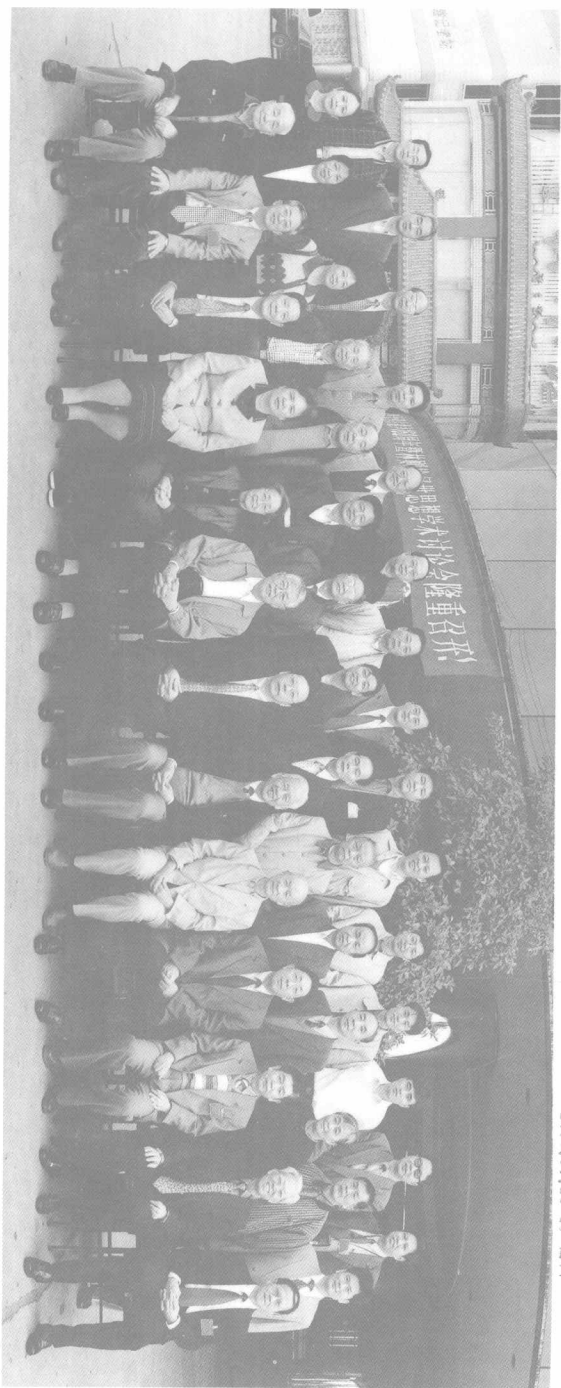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5034-1234-8/K·0853

定 价: 1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印刷厂负责退换。

纪念鸦片战争160周年暨林则徐经世思想学术讨论会

2000.11.26-28 福州



目 录

综 论

论林则徐经世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主要内容	林庆元 翁纪阳(3)
道光朝经世派的主要成就述略	邱勇强 王 民(14)
鸦片战争前鸦片论议中的经济思想	郑剑顺(33)
再谈包令关于林则徐的一篇论文	刘存宽(43)

林则徐的经世思想

林则徐经世思想的形成及基本内容	林庆元(51)
论林则徐的“师夷”、“制夷”和“款夷”思想	林庆元(66)
林则徐经世思想的时代特征	史林杰(81)
林则徐及其幕府的商办思想	罗肇前(89)
林则徐与两淮盐制改革	王申筛(94)
林则徐与税务告示碑	王申筛(106)
《畿辅水利议》与林则徐的经世思想	陈友良 王 民(109)
论林则徐经世思想中的海防观念	林庆元(113)
林则徐与香港海防	刘蜀永(123)
林则徐对经世之学的运用	林其泉(127)
林则徐思想境界探讨	林友华(133)

林则徐与经世派

- 朱熹与林则徐思想研究…………… 黄保万(143)
- 林则徐与林雨化思想之比较…………… 邓华祥 肖忠生(149)
- 林则徐与冯桂芬的重农思想与货币思想之比较
…………… 李 瑾 俞 政(156)
- 林则徐与魏源经世思想的比较研究…………… 孙占元(166)
- 林则徐与梁章钜…………… 刘心坦(176)
- 林则徐与陶澍…………… 邓绍根(187)
- 林则徐与左宗棠的经世思想之比较…………… 杨东梁(199)
- 经世派中的重要一员——梁廷枏…………… 戴学稷(208)
- 冰清玉润 先后辉映
——记林则徐与沈葆楨…………… 沈 骏 古 清(214)

附 录

- 研究林则徐思想的一部力作
——评《林则徐评传》…………… 翁纪阳(220)
- 包令评林则徐(摘译)…………… 谢天冰(223)
- 林则徐会试墨卷及其他…………… 官桂铨(231)

简讯二则

- 林则徐经世思想研讨会在福州召开
…………… 福建省林则徐研究会(235)
-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160 周年研讨会在福建武夷
市召开…………… 福建省林则徐研究会(237)

综 论



论林则徐经世思想产生的 时代背景及其主要内容

林庆元 翁纪阳

—

乾隆五十年(1785年),后来成为中国伟大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诞生在福建侯官县。从此,他与这个王朝一起,经历着由盛到衰的历史转折,同时也经历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破关进入中国大门的转折。中国发生了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也遇到数千年未曾有的强敌,首先是英国。

英国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奇迹般地发展。它的工业产品占全世界工业产品总和的45%,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然而,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是与对海外殖民地的掠夺相伴而行的。

中国自1637年就与英国建立了通商关系,由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1637年,第一次来华的英国船,“并没有卖出一件英国货,只是抛出了八万枚‘西班牙’银元”^①。1751年,英国四艘船来中国,只载有10 842磅的货物,而现银却值119 000镑^②。这种状况到19世纪初还没有多少改变,加上清王朝施行对外贸易限制的政策,这些都使英国政府感到不满,造成中英长期的矛盾。但随着工业资产阶级的崛起,“自由贸易”理论的施行,英国政府日益感到,与中国的商务关系必须放在一个新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所谓的“商业条约”,即按英国资产阶级的扩张要求制定的条约。1793

年,英国政府派出的马戛尔尼来华代表团,就是带着这个任务的。这位英使臣竭力避免以一个区区商务代表的身份出现^③,因此,请中国朝廷考虑^④。这表明所谓的“商业条约”,只不过是英国政府欲使中国逐渐殖民地化的初步方案。但因为乾隆统治时期国力强盛,因此英国不敢更为露骨地要求。乾隆皇帝对马戛尔尼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⑤表示领土不容分割。封建地主对于领土的被占领,历来是十分敏感的,但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不同于封建国家所具有的方式,却毫无觉察,只是出于“闭关”思想与“天朝上国”的盲目虚骄,笼统地拒绝其要求。清政府当然不可能意识到,马戛尔尼的这些要求,正是半世纪以后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及附约的雏形。这个关系中国民族命运的条约,在马戛尔尼时代,英国政府就企图用外交的手段取得。

马戛尔尼使命的失败,意味着外交手段无法使清政府就范,于是英国政府使用武力进行尝试,从而使这次来华使命失败后的中英关系日益恶化。

中英矛盾主要围绕以下问题激化:

(一)英国人在中国领海与领土上犯罪,拒绝接受清政府按大清律例审判。在中英贸易关系史上,从1689年至1821年,发生了至少十起英国人在中国领土、领海上杀死、打伤中国百姓的犯法案件。早在1689年即发生了英国兵船“狄番斯”号水手杀害中国平民的犯法行为。此后这类案件不断发生。如:1722年“乔治国王”号水手伤害中国儿童事件;1773年,英国人斯高特在澳门杀害中国人案;1784年英国兵船炮手打死中国百姓案;同年,英“提休”号开炮打死中国人案等。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后,英国人犯罪活动更为频繁。1800年发生“朴维顺”号水手开枪伤害中国人案;1807年英“奈顺”号水手打死中国人案;1810年“夏罗德”号水手杀害黄开胜事件;1821年,美国水手掷伤中国船上妇女,导致其溺水而死事件;这一年还发生英国“陀巴士”号兵船水手杀害黄亦明、沈大河

事件与“麦尔威理夫人”号水手杀害中国妇女事件^⑥。此外,也发生了一些中国人杀死英国人事件或外国人互相杀害的事件。这些犯罪活动都发生在中国境内,当然应受中国政府法律制裁。

这些事件的处理,关系到中国政府的管辖权问题。清政府历来坚持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犯罪,也应按照大清法律,由清政府官员审判。1773年,一名中国人在澳门被英国人斯高特杀害后,清政府立即对其进行指控。但葡萄牙法庭却宣判其无罪。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根据“中葡关于澳门协定”规定,派官员前往澳门验尸,并要求作最后的判决,处死斯高特^⑦。这是清政府最早处死在中国境内犯罪的英国人的一次。此外,外国人互杀案,“犯人还是交给中国当局,由本省巡抚命令公开处以绞刑”^⑧,这表现了中国政府主权的独立。但英国很早就企图保护本国犯罪分子,攫取领事裁判权。上述事件发生后,1780年,有一位外国历史学家写道:“这是一欧洲人在中国杀死另外一个欧洲人而被处死刑的第一个事例,并且也是被认为造成了一个危险的先例。”^⑨英国政府为抗拒这种“先例”的发展,于1784年炮手打死中国人案发后,施加炮艇威胁,所有英商、法商、荷商、丹麦商和美商,采取了共同行动,调动了所有船只上的小艇,配备了人员和武器,来保护各商馆。当时,乾隆皇帝不屈于威胁,仍发布命令,把英国炮手处以绞刑。这本来属于一个国家的主权范围,可是,当时以及以后一些外国评论,竟攻击“中国司法是野蛮的,以及指控那些负责把被控犯有罪行的国人交给中国审判的人们”^⑩。1787年英国政府在这背景下派出加茨喀特来华,提出英人不受中国领事裁判限制的侵略要求。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

(二)英国长期窥伺的除领事裁判权外,还想占领中国领土澳门,取葡萄牙而代之。澳门虽被葡萄牙强租,但我国政府一贯持有主权并行使对澳门的领土管辖权和行政管辖权以及其他主权。英国先是企图占据舟山,因清政府的反对未能实现,转而窥伺澳门。早在1781年,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即写信给印度总督,公然声称澳

门“不过是浪人和匪徒的巢穴”，主张“从葡政府手中取得，使之成为东方大港”^①。马戛尔尼来华，也带有窥伺意图。1802年，英国印度总督借口法国入侵葡萄牙危及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在派兵船协助葡人防守的幌子下窥伺澳门。这是一次试探性的侵略活动。1808年，英法战争爆发，英国借口“保护各港脚以及澳门”，“以免法兰西占住澳门”^②，先后派出军舰13艘，侵略军760名，公然占领了我国领土澳门，继之又入侵虎门。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后，清政府的态度非常坚决，除了停止中英贸易外，还调动了军队，防守澳门、黄浦。战争一触即发。这时两广总督吴熊光企图和平解决，采取妥协态度，但中央政府态度强硬，对英国的侵略逻辑严加驳斥，指出“若云因恐法兰西欺侮西洋，前来帮护，殊不知西洋夷人既在中国地方居住，法兰西焉敢前来侵夺，以致冒犯天朝？即使法兰西果有此事，天朝法令具在。断不能稍为姑容，必当立调劲兵，大加剿杀，申明海禁，又何必尔国派兵前来，代为保护”，并揭露英国“意图占住，大干天朝厉禁”^③。当时，英国还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与中国较量，因而被迫退回。

（三）不断侵犯我国海域，也是英国妄图殖民化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在1799年，英国兵船二艘公然停泊于我三门炮台之对面海中，相距只有5000米之遥，距南山炮台亦仅四五千米之远^④。1800年，英国兵船无视我禁令，公然开进我国领海黄浦及三角洋一带^⑤。此外，英国还凭其海上强国之势，肆意在我领海上捕获别国商船。早在1742年，英国与西班牙交战，英国在我海面捕获西班牙船一艘，并带进我省河^⑥，侵犯我主权。1745年英兵船又捕捉法船一艘，清政府提出抗议，警告英国“若伤法郎人，即将尔国之黄浦者抵偿”^⑦。但英国政府仍肆无忌惮，于1814年又发生捕捉美国船事件。清政府一再声明，英国兵船“既驶至内地洋面，即应凛遵天朝禁令”，“如敢不遵，……将该兵船立即击沉”^⑧。但英国海军越来越频繁活动于我领海，这表明英国决心对中国奉行炮舰政策。1784年“赫符斯”号犯罪水手被清政府惩处后，英国统治者很快意

识到“中国人对于他们自己的鲁莽行为也很恐慌,对方假如能稍为坚定一点,也许就保全了这个人的性命”^①。英国政府正是看穿了清政府的弱点,才越来越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并以炮舰作为他们向清政府讹诈的后盾。

1816年阿美士德使华,这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随着对中国经济扩张的进展,英国越来越感觉到清政府的限制政策成为它对华贸易的障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经东印度公司多次要求,英国政府于1816年派出了阿美士德为代表的使团来华。临行前,英国外相罗加事理给阿美士德的训令内容主要有“使以后英商不遭受广州当局的无礼及不公待遇,确定公司的权利,安定广州贸易的进行,英商得自由与当地商人交易,中国官吏不得任意侵入公司商馆”^②。此外,要求“取得驻使北京的允许和开通广州以北港口……设法推销英国的制造品”^③。总之,要求“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建立在一种安稳、健全和公平的基础上,避免地方当局任意侵害,并受到中国皇帝及钦定章程的保护”^④。所谓钦定章程,就是我们日后所看到的不平等条约。阿美士德出使中国,同马戛尔尼比较起来,中英关系更加恶化。嘉庆皇帝对他更为戒备。他的使命也完全失败。但这次来华,阿美士德已与马戛尔尼大为不同,态度十分强硬,炫耀“伊国尚有一千只、每只可容兵三四百名”^⑤的船炮。据马士说,当时就已经有了这样一种舆论,“即认为英国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条是以武力强迫中国根据合理的条件管理贸易,一条是绝对服从中国所可能制定的一切规章,另一条是根本放弃贸易”^⑥。这表明,英国在以外交手段攫取不到侵略特权之后,越来越走向武力威胁的道路,以实现马戛尔尼所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从1637年到1839年的两百年来,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展,英国正在一步一步地使亚洲一些国家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19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传教→通商→大炮三部曲,向着古老的中国叩关而入,从而开始了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生死的搏斗。林则徐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潮里被推

向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前线,力图顶住中国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沉沦,成为开辟“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动民众持刀杀敌的反侵略道路的先驱。

二

清满洲贵族取代明王朝之后,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封建的经济、政治、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可是,封建地主阶级掠夺与兼并土地随之加剧,从而使封建社会各种矛盾愈加尖锐。乾、嘉之后,不但阶级矛盾尖锐化,而且各种社会弊端丛生。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生产凋蔽,国力衰微,呈现出一种“末世”的景象。龚自珍经过敏锐而深刻的观察之后,指出当时的社会就像是“将萎之华,惨与槁木”。

清代乾嘉之后的土地集中是惊人的。据载,乾隆初期湖南地区“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②,结果是“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③。这种剧烈的分化,不但威胁着自耕农,而且也使部分中小地主破产。

在土地兼并的历史过程中,一方是越来越富的地主,一方则是失地的流民。乾隆时期的和珅,占有土地多达八千余顷。到嘉庆以后,拥有万亩土地的地主更多。如湖南衡阳刘姓地主“田至万亩”^④。道光时期,江苏吴江县地主沉懋德“有田万余亩”^⑤,琦善的土地多达二百五十二顷十七亩。而满洲旗人仍然过着寄生生活,既不懂得打仗,也不懂得生产。

寄生于封建经济基础上的庞大的清朝各级官吏队伍,也迅速腐化。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日益腐朽与反动,它培植了一批贪婪、愚昧、自大、无能、“多磕头少说话”的官吏。龚自珍深刻指出:“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非所问也”^⑥。这些大官僚,只知“低头拱手谈性命”,尊奉空疏的程朱理学,禁锢人们思想,不问生产,只知贪污受贿横征暴敛。这批大官僚地主已经失去对发展社会经济和生产的兴趣。这批大官僚

大地主的贪婪,不但破坏了生产发展,也为封建国家带来了隐患。嘉庆以后,由于阶级矛盾尖锐化,人民生活日益贫困,耕地面积比嘉庆前减少了“五十余万顷”^⑨。当时,清王朝财政主要来源于地丁税、盐税、漕米以及关税。可是由于鸦片走私、河工破坏、天灾人祸,以致如魏源所称:“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漕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⑩魏源还指出乾嘉之后,从士大夫中选拔的人才,“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罔知漕、盐、河、兵得失何在”^⑪。魏源把这些社会政治弊病概括为“病漕、病漕、病吏、病民之患”^⑫。而统一边疆的百年战争,使军费耗资达12 900万两。乾隆中叶以后,仅军费一项,即占总支出的51%。这不但使财政危机加重,而且也由于向农民转嫁这种危机而使阶级矛盾加剧,从而造成了农民的骚乱与起义。总之,吏治腐败,社会不安,生产凋敝,财政枯竭,成为当时十分突出的矛盾。当时,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虽然看到这些“时弊”,但并不了解这是由于封建制度造成的。他们希望通过一些改革,使封建王朝继续统治下去。这就是19世纪初地主阶级改革思潮兴起的社会背景。

三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到嘉道年间已演变为经世思潮,也称实学思潮。它产生于明末清初,而兴盛于嘉道年间。

道光以后,由于“乾嘉盛世”的迅速消失,社会矛盾的激化,加上西方开始入侵,使有识之士从“皓首穷经”书斋里惊醒过来,逐渐认识到“衰世”的到来。他们进一步意识到汉学的“恒订琐屑”,宋学的空疏无用。于是,士林风气为之一变:由古文经学走向今文经学,由考据走向经世致用。常州的庄存与、刘逢禄及其学生龚自珍、魏源代表了这一时代学风的转变。如果说龚自珍经世致用思想的特色在于“讥切时政,抵排专制”,那么魏源的经世致用的特色则在于“兴利除弊”。而后者的思想,已超过了经世实学的水平,打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旗号,他的思想开启了后来的洋务思潮。

因此,龚、魏既是明清实学的继承发展者,又是近代新学的先驱。

道光年间的经世思潮,是明清实学思潮继承和发展的结果。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它有自己的时代特点。除了面向世界的新思潮外,就学派而言,则出现了汉、宋调和或融合的趋势。如曾国藩原来崇尚理学,后来也主张汉、宋兼蓄,提倡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熔于一炉的经世之学。这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这些经世派,已不像宋学家那样,排斥异己,独尊儒术。相反,他们兼收并蓄,对各个学派加以包容。他们不仅研究儒家,而且也研究诸子百家,注意的不仅是学术理论,还主张“通经致用”,用经学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and 国计民生,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

(一)由于他们要求改革时弊,便不能不对僵化的保守的正统理学进行清算和批判,从而使人们扩大研究视野,转变学术风气。如龚自珍在深刻揭露封建政治弊病的同时,还对儒学独尊的地位提出挑战,公开宣称“兰台序九瀛,儒学但居一”,并猛烈地抨击理学使人“疲精神,耗目力”,是“无用之学”;讥汉学为“琐碎钁钉”。他认为学术风气必须抛弃空疏与繁琐,方有益于世,所以自称“好杂家之容”,提倡“东西南北之学”,研究边疆史。又如包世臣,更明确地斥责宋学只知空谈性命“鄙夷田事”。这些呐喊,对改变社会风气,使之趋于务实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思想界包容其他学说,包括西学开辟了道路。

(二)宣扬进化的历史观和社会改革思想。龚自珍模糊地认识到,变化是一种历史趋势,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他根据这一进化的历史观,向清政府提出“更法”,指出清政府不能“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否则就可能改朝换代。魏源则更进一步反复证明历史变革是不能逆转的,“虽古之圣王,不能使甲兵之世还于无甲兵”。但他认为,要变的只是器,而“其不变者道而已”,即君臣、父子、夫妇这些封建伦理及秩序不能变。这种理论即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嚆矢。

(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观点。历史理学家宣称不言利,

只言义,以维护其剥削制度,把言利的市民看作小人。这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压抑。而龚自珍则公开宣扬“言私”、“言利”、“言富”。魏源提出保护“有田之富民”与“无田之富民”,主张“利国、利民、利官、利商”。此外,还提出在河工、漕运、盐政、农政方面兴利除弊。这一切,都对封建主义价值观有一定程度的冲击,为洋务运动做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

(四)重视科学研究和实验。经世派反对惟儒家书籍是尊,不薄杂家。林则徐十分重视“研究舆地、象纬及经世有用之学”,而且研究《农政全书》、《潞水客谈》等书,还重视农学,提倡水利,搞科学实验。魏源的《海国图志》还特地辑录了有关西方近代天文地理及军事科学知识的文章。经世思潮为科学发展创造了一种良好的学风,使知识分子从儒家的典籍里摆脱出来,扩大了学术视野,并培育了一批近代早期的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

明末清初以来,与经世思潮兴起的同时,西学也随着传教士的东来进入中国大门。徐光启与利玛窦译的《几何原本》及其他西方自然科学的翻译,使中国文化开始与西学汇通。由于清政府推行闭关政策,使这股学西方热潮半途中断。鸦片战争前夕,由于中西交流日益频繁,再度来华的传教士也开始用新的形式传播西学,如办医院、办报纸、办学校等,使西学又开始兴起。经世思想与西学开始交汇,经世派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开始从注重“时务”,扩大到注重“夷务”。林则徐就是在这样特定的文化思想熏陶下成长的。传统文化是林则徐高尚思想品德、爱国情操形成的深厚土壤。同时,林则徐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爱国、重民和改革的思想也丰富了这一时期的经世思潮,丰富了中国近代思想宝库。

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林则徐所处的时代,正是国内外形势剧变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叩关带来的商品和大炮,向人们提出了反抗西方侵略的崭新课题。清政府的腐败和衰落,也使有识之